

历史地理分野如何影响现代埃及发展

文 / 段九州

古埃及曾被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上埃及象征图腾以秃鹫为代表，下埃及象征图腾以眼镜蛇为代表。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定都孟菲斯，从此开启古埃及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在法老王朝的王权象征中，“白冠”代表上埃及，“红冠”象征下埃及，上下埃及统一后，两种

王冠被结合成“双冠”。

上埃及和下埃及不仅是地理的划分，更是权力与文化的隐喻。这种划分对于现代埃及社会、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何为上埃及和下埃及

绵延数千里的尼罗河塑造了

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也造就了南北气候、环境的迥异。从地理上看，上埃及指的是尼罗河中游至南部，包括卢克索、阿斯旺等省份，其地势高、气候干燥；而下埃及主要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及开罗、亚历山大所在的北部平原，其地势低、土地肥沃，与地中海地区交往频繁。尼罗河下游河谷平原和河口三角洲是埃及最富庶的地区。文化上，上埃及受南部非洲文明影响，保留了更多古老的风俗、方言以及部族传统，宗教活动更为活跃。而下埃及则受到外族入侵的深刻影响。公元前525年，埃及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埃及相继被希腊和罗马征服。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逐渐阿拉伯化，成为伊斯兰教一个重要中心。下埃及因更早接触外来文明，城市化发展较快。

这一地理文化的差异，在近代以降被赋予新的内涵。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他实行改革，促进经济文化发展，使埃及发展成为地中海东部的强国，也因此被誉为“现代埃及之父”。这一时期埃及国家建设资源集中于下埃及的沿海城市与首都开罗，而上埃及仍是尚未开发的内部边疆。20世纪中后期，埃及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纳赛



图为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中的导览资料。

尔在任内改革土地制度，加快工业化建设，其倡导实施的工业化项目曾短暂向南部上埃及地区倾斜，但上埃及与下埃及地区发展仍有巨大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埃及的政治精英、军队高层与知识分子仍主要来自下埃及省份。现代埃及共和国的总统，除了第一任总统纳吉布来自上埃及之外，其余都来自下埃及。在当代埃及的大众叙事中，“上埃及”常被描绘为保守、宗教氛围浓厚、家庭结构复杂、文盲率高的地区，而“下埃及”则被视为城市化和教育水平较高以及开放包容的地区。这种二元结构，强化了地理差异背后的社会认知偏差，也造就了上埃及人在就业、政治代表性、公共资源分配上常处于劣势。

2011年后埃及多次选举结果显示，上埃及选民的政治取向与三角洲地区有显著差异。换言之，更保守、更重视传统价值的南方，往往成为伊斯兰政党与传统派别的票仓。上、下埃及政治分野背后还隐藏着经济的落差。当北方精英讨论民主转型时，南方民众更关心面包价格和就业机会。

事实上，在当代埃及，尤其是2014年塞西掌权以来，上、下埃及的分野并未消失，反而在基础设施、文化话语、社会政策和经济结构中重新书写。塞西时代

被分析人士称为“埃及第二共和国”，意味着执政者试图在政治稳定与国家建设之间寻求新平衡。然而，南北发展失衡依旧是埃及面临的重要内部挑战。

为振兴上埃及投入大量资源

当前埃及政府高度重视上埃及地区的发展，在国家战略中将其定位为“优先发展区域”之一。2016年，埃及启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2030愿景”。然而，地域差异是该愿景实现的关键现实阻力。因此，根据2014年埃及宪法第27、176和236条强调农村和上埃及地区发展重要性的规定，埃及政府与世界银行于2017年启动了上埃及地区地方发

展计划（UELDP），并在索哈杰省和基纳省进行了试点。根据相关法律，埃及政府还成立了上埃及发展局，它是直属埃及总理的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制定加快上埃及全面发展的政府规划。

针对上埃及地区，埃及政府推行的主要举措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基础设施重塑、乡村振兴、产业投资与社会治理。今年9月埃及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政府已为上埃及地区单独拨款657亿埃及镑，用于基础设施改善与乡村振兴项目。塞西政府将基础设施视为“国家能力可见化”的象征工程。全国性的“国家道路计划”覆盖了南部的明亚、索哈杰、奎纳、卢克索与阿斯旺等地，拟通过修建或翻新高速公路、桥梁与



2025年10月5日，埃及卢克索，游客参观卡纳克神庙。

铁路，使上埃及首次系统性地纳入国家交通主干网。与此同时，电力、水利与通信网络的延伸也成为上埃及现代化的关键标志：阿斯旺地区的水坝系统得以升级；农村电网覆盖率上升至98%以上；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改善让偏远村镇接入数字化经济网络。这些工程建设也是一种政治表态，即国家权力通过道路与电线，重新进入南部社会的“毛细血管”。

2019年启动的“体面生活”计划，是塞西政府“社会再分配”的代表性工程。该计划覆盖上埃及14个省份，旨在改善农村住房、医疗、教育与水电设施，直接受益人口超过3000万。埃及政府称这是“埃及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与地方发展项目”，资金投入数额占全国社会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二。该计划的政策逻辑在于“重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能见度”。上埃及的农村地区此前因行政力量薄弱、部族关系强势而呈现“准自治”状态，中央通过该计划重新确立了“国家—地方”的直接连接。医疗诊所、学校、社区中心等基础设施不仅服务民生，更成为国家行政触角的延伸。通过“体面生活”计划，埃及政府有可能利用现代福利体系取代上埃及的部族保护体系，从而以发展重塑地区政治忠诚。埃及官方媒体今年刊载的一篇报道中的数据显

中获得约68%的预算分配。

经济结构调整是上埃及发展的核心难点。长期以来，南部经济以农业和公共部门就业为主，产业单一、就业不足。塞西政府尝试通过多维度政策激活地方经济：一是鼓励外资与国内企业在上埃及设立工业园区与农产品加工基地，如索哈杰工业区和奎纳工业区。二是推动文化与旅游产业复兴。卢克索与阿斯旺被纳入“古文明旅游走廊”，政府重修神庙、开通夜游尼罗河项目，并尝试通过国际活动，如“法老的黄金游行”，带动南部文化经济发展。三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与灌溉优化，以解决南部农地碎片化、生产率低的问题。

塞西政府深知，上埃及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命题，更是政治整合工程。长期以来，部族文化、宗教保守主义与低教育水平使该地区成为社会治理的“灰色地带”。因此，国家采取“双轨制策略”：一方面通过教育、青年项目与文化活动软化地方宗教结构；另一方面以数字治理与安全机制强化国家治理。比如，安全部队与地方宗教领袖之间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资金与荣誉激励，让地方长老成为“社会稳定的合作者”。

新规划能否打破千年困局

近年来，塞西政府将上埃及地区的综合振兴列为国家战略

重点，投入了规模空前的资源。然而，这一进程依然面临复杂而深刻的挑战，亟待战略层面的再设计与制度的革新。上埃及虽然被纳入国家发展议程中，政府提出如乡村项目、农业与水利投资计划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临执行难度大、资金配套少、地方治理薄弱等问题。比如，尽管2021年埃及在国家层面宣布将卢克索与阿斯旺作为文化旅游领域升级改造的重点，但由于基础设施更新进度缓慢，青年就业机会不足，大量南部居民依旧继续向北方城市迁徙，进一步削弱了上埃及的社会资本。再比如，上埃及地区部族结构、宗教保守主义与父权家庭秩序仍具有强大惯性，这使得国家推行的现代社会项目在落地过程中屡遭文化摩擦。像女性就业、计划生育、现代教育等议题常引发地方社会抵制。与此同时，政府的宣传与政策往往缺乏地方语言与文化的“翻译机制”，现代性话语难以真正进入地方社群内部。

尽管挑战重重，埃及国家与社会依然可以摸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之路。整体而言，上埃及的开发不是简单的经济议题，更是社会稳定、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再造的综合性工程。埃及如何在现代治理与传统社会结构之间找到平衡，是个关键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